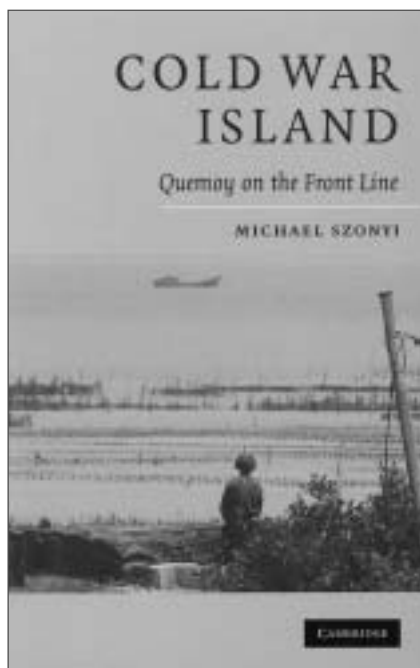


## 金門——戰地黃花份外香

● 梁加農

提起冷戰史上的金門，很少有人想到：彼時彼地小小百姓過的是怎樣的一種生活？宋怡明的《冷戰島》便是一本以金門居民的口述歷史和村級檔案為主、從社會史角度探討金門普通人生活的新穎專著。



Michael Szonyi,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提起冷戰史上的金門，人們往往想到的是「萬炮轟金門」，學界的研究興趣多為台海危機時中、美、蘇的大國博弈，卻很少有人想到：彼時彼地小小百姓過的是怎樣的一種生活？他們記憶裏的冷戰故事又是怎樣的一種敘述？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宋怡明 (Michael Szonyi) 的新書《冷戰島——處於前線的金門》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以下簡稱《冷戰島》，引用只註頁碼)，便是一本以金門居民的口述歷史和村級檔案為主、從社會史角度探討金門普通人生活的新穎專著。

全書分四部，第一部「地緣政治化的形成」和第二部「軍事化與地緣政治化的變遷」敘述了從1949年10月古寧頭戰役、1954至55年和1958年炮戰(第一及第二次台海危機)，到1960至70年代金門軍事化時期建立的「三民主義模範縣」和「戰鬥村」，如何改變着金門島的社會結構和日常生活，說明地緣政治和軍事化的互動是1949年後金門史的中心和關鍵。第三部「冷戰時期的生活」探討戰地經濟、婦女生活和鬼神迷信，展示冷戰格局對社會和文化的多面影響。第四部「去軍事化和後軍事化」着重探討居民對冷戰歷史記憶和敘述的問題。

### 一 軍事化與現代化

金門原為中國大陸邊緣的一個蕞爾小島，遠離政治和軍事紛爭中心，基本處於前現代社會狀態，也是一偏文化之地。但在1949年，金門卻突然變為國共內戰的最後戰場，並進而成為其後二十來年國際

冷戰的前線和熱點。由此，島上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方式、社會結構、價值觀念等發生了快速、深刻、現代的改變。

在後發外生型的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有一個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權力中心，對各種社會力量和利益關係進行強有力的干預和調節，同時保持社會的穩定。從這個角度出發，有論者指出以軍事化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也是一種積極、有效的途徑。在現代中國，類似的主張較早就有。1914年，國民黨第一代領袖孫中山在《中華革命黨總章》中就提出革命程序分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97）。到國民黨失去大陸、退守金門，從1956至1992年在金門實施戒嚴法、建立軍管區、實現現代化，就為軍事化與現代化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極佳的中國案例。

《冷戰島》以冷戰時期的金門史探討了互為關係的四種現象——軍事化、地緣政治、現代化和回憶。在軍事化與現代化關係方面，作者比較了世界上其他高度軍事化社會的現代化研究資料，如與台灣同列東亞現代化成功範例「四小龍」的韓國在軍人專制下現代化的過程（頁252，另參見Gregg Brazinsky, *Nation Building in South Korea: Koreans, Americans, and the Making of a Democrac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更進一步提出五方面因素的合力，即社會秩序、現代意識、威權政府、弱勢社會，以及全球冷戰格局與金門具體事務的緊密聯繫，推動了金門在軍事化下向現代化的社會變革。在

這一過程中，軍事化的動力更多是出於政治考量而不是真正的軍事原因（頁243-44）；或者可以套用一句國民黨的老話：「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這裏的政治考量也包括全球冷戰格局下東西方的意識形態之爭。1960年代國民黨花大氣力在金門軍事化條件下搞「三民主義模範縣」，就是為了展示台灣實現現代化的發展道路優於中國大陸（頁82-83）。書中還詳細地敘述了金門通過遣返大陸逃亡者、利用海上漁民交流、建立對大陸廣播的短波電台，以及空漂傳單等反共宣傳，來向大陸傳播其現代化的成就（頁92-95）。不過，本書沒有論及這些活動對大陸造成的實際影響。

以常理看，在當年大陸嚴密的社會控制下，這些傳播產生的影響應當極為有限，但其實並不盡然。1950至70年代大陸一連串的極左錯誤，確實使一些青年接受了台灣宣傳的影響，例如南方各省不時有城鄉青年因「偷聽敵台」進而與台灣方面聯繫的案件發生。另據曾任解放軍海軍第一政治委員的李作鵬回憶，1960和1962年先後發生的大陸戰機叛逃台灣事件，也與飛行員「偷聽敵台」有關（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頁508-509）。

## 二 「大兵經濟」和軍妓

根據大陸方面的材料，1958年台海危機時國民黨軍駐扎在金門的士兵有95,000人，佔其地面部隊的三分之一（逢先知、金沖及主

1949年，金門突然變為國共內戰的最後戰場，並進而成為其後二十來年國際冷戰的前線和熱點。由此，島上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方式、社會結構、價值觀念等發生了快速、深刻、現代的改變。

在重兵駐扎的外力下，金門經濟被扭曲成了繁榮異常的「大兵經濟」，或當地俗稱的「阿兵哥生意」，島上約10,000戶居民註冊了4,000多家商號，其經商比之高為人類歷史所極為罕見。

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850〕；而當時島上居民只有約47,500人(頁75)，軍人人數幾乎是平民的一倍。在重兵駐扎的外力下，金門經濟被扭曲成了繁榮異常的「大兵經濟」(G. I. Joe business)，或當地俗稱的「阿兵哥生意」，以冷飲店、快餐店、茶室、髮廊、遊戲房等為駐軍服務的特種行業為主，島上約10,000戶居民註冊了4,000多家商號；換言之，約40%人家有自己的生意，其經商比之高為人類歷史所極為罕見(頁134)。

書中第三部有關婦女生活一節探討了島上軍妓、軍屬、女兵三類婦女的生活。隨着大批軍人登陸金門，大大衝擊和改變了島上的婚姻面貌。一方面，島上一些年輕漂亮的女性通過與駐軍高級軍官聯姻而迅速改變了家庭的社會經濟狀況；另一方面，由於大批軍人湧入造成性別比例的高度失衡，又使島上不少高齡未婚女性、寡婦、棄婦等通過與駐軍低級軍官或老兵結合而解決了婚姻難題。更有意思的是，書中記載1950年代初島上食物供應極度緊張，商店職員和食堂伙夫因能就近獲得食物，而在婚姻上比軍官更受女性青睞(頁160)。這使人聯想到那個年代地球另一端的冷戰熱點、圍城裏的柏林居民的相似生活(Paul Steege, *Black Market, Cold War: Everyday Life in Berlin, 1946-194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書中還比較詳細地披露了島上軍辦妓院的歷史。軍辦妓院，正式名稱是「軍中樂園」或「特約茶室」，當地俗稱「831」。後者據說來自髒話

「女陰」的中文電報字碼83111。至1965年前後，島上共有10家妓院，每家有10至40名妓女(頁151-52)。這些妓女都來自島外，沒有島上居民；而且所有妓院無一例外地都是軍辦，是當地駐軍的一個部門，有關費用列入駐軍預算。駐軍軍醫為妓女定期體檢，以防性病流行損傷部隊戰鬥力。據說不少從大陸隨國民黨退守金門的老兵，把他們的薪水差不多全花在妓院了。在1950年代，普通士兵的月薪只有新台幣7至12元，而一次軍妓服務標價是10元(頁154)。

島上軍辦妓院是公開的，其建立初衷是維持駐軍軍紀，抑止強姦、鬥毆等，事實也的確大大改善了當地的治安。在書中收錄的一幅「金門軍樂園」歷史照片上，大門兩側掛着「服務三軍，鼓舞士氣」的大字(頁152)，在在顯示國民黨軍確乎是一支世俗化的軍隊。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在與金門對峙的大陸，妓院早已絕迹，解放軍更在「突出政治」、「四個第一」、「學習雷鋒」等口號下，走向清教徒式的生活。一水之隔，同文同種的兩軍在冷戰中面貌迥異！可惜書中沒有比照大陸的相關內容，也較少徵引大陸新近出版的有關資料。

### 三 現實政治與回憶

書中的第四部探討了1970年代後，隨着中美恢復邦交，金門局勢緩和及逐步去軍事化，島上居民回憶裏的冷戰故事是怎樣一種敘述的問題。作者對島上居民作了約70場口述歷史採訪，並收集了約170份其他學者的口述史料(頁10)。這些處於

不同地位、環境的普通民眾對冷戰時代生活的回憶和感受，使人們了解到的那段歷史更為全面和多樣。

但是，作者也清楚知道口述史料並不那麼可靠，往往會有誤差，包括被訪者有意或無意地模糊記憶、混淆人事、突出自我、迴避某些敏感問題等等。如很多島上居民說，從金門移居台灣等外地在台海危機時是被禁止的，他們是被強留危島的(頁224)。但沒有文獻材料支持禁止金門居民外移的說法。還有一位與島上寡婦結婚而定居下來的老兵說，正是由於他們在1958年炮戰中挫敗了解放軍攻佔金門的企圖，毛澤東才被迫下台，把國家主席的位置讓給了劉少奇(頁232-33)。1959年劉代毛出任國家主席是事實，但沒有任何文獻顯示此事與台海危機有關。因此，作者花了不少篇幅講述研究方法，並將他的方法歸納為傳統文本研究與當地田野工作和口述歷史相結合，探討當地歷史的同時，沒有忽略從大處着想(〈前言〉，頁xi-xii)。

書中的第四部還有一節專門探討現實政治與回憶的關係，指出島上居民對現實的不滿和要求補償等現實政治因素，影響了他們對過去經歷的回憶和向外人的敘述，口述歷史帶有集體意識的選擇性印記(頁225)。如很多被訪者都說到戰時家裏的門板被沒收去作工事，自己出錢買軍裝，自帶乾糧去軍訓，大量的無償勞動以及生活的艱辛，呈現出一幅被壓迫的歷史圖景。但另一方面，被訪者又大談其保家衛國的無私奉獻，以及過去的良好治安和軍民的互助和諧。這都與現實的政治經濟狀況有關。

一方面，隨着金門局勢緩和，尤其解除戒嚴後，駐軍減少，「大兵經濟」大幅萎縮，到1980年代末金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只有整個台灣地區的三分之二，而且前景不明，社會不滿情緒加劇(頁208)。另一方面，1987年後台灣走向民主，開始對過去受到不公對待的群體，如「2·28事件」的受害者，進行補償。在金門，要求補償的呼聲高漲。一位當地歷史學者說，「沒有金門的軍民犧牲，就沒有台灣的經濟奇蹟。」(頁233)可見現實政治因素會影響他們的敘述。因此，期待口述史料完全客觀是一個很難企及的目標，研究者對之要小心鑒別和判斷。

作者在〈前言〉說，他在2001年9月第一次踏上金門島並開始蘊釀此書的寫作(〈前言〉，頁xii)。其時他是多倫多大學的年輕教授，筆者曾選過他的一門「中國現代對外關係史」課，還見他有時在校園裏推着搖籃裏的小兒。筆者猜想，那便是此書扉頁上提到的羅伯特(Robert)。作者在多大完成本科學習，及後獲得羅德獎學金(Rhodes Scholarship)前往牛津大學讀博士。2005年後，作者到哈佛任教，主要研究明清社會史，曾以福州村民為案例，出版過《實行家族：明清家族組織研究》(*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其研究方法與此書有相通之處。作者雖有漢名，卻是一個純粹的外國人，不遠萬里，研究中國。讀他的《冷戰島》，讓人看到國際學界對冷戰故事，也可有另一番講法。

口述史料並不那麼可靠，往往會有誤差。因此，作者花了不少篇幅講述研究方法，並將他的方法歸納為傳統文本研究與當地田野工作和口述歷史相結合，探討當地歷史的同時，沒有忽略從大處着想。